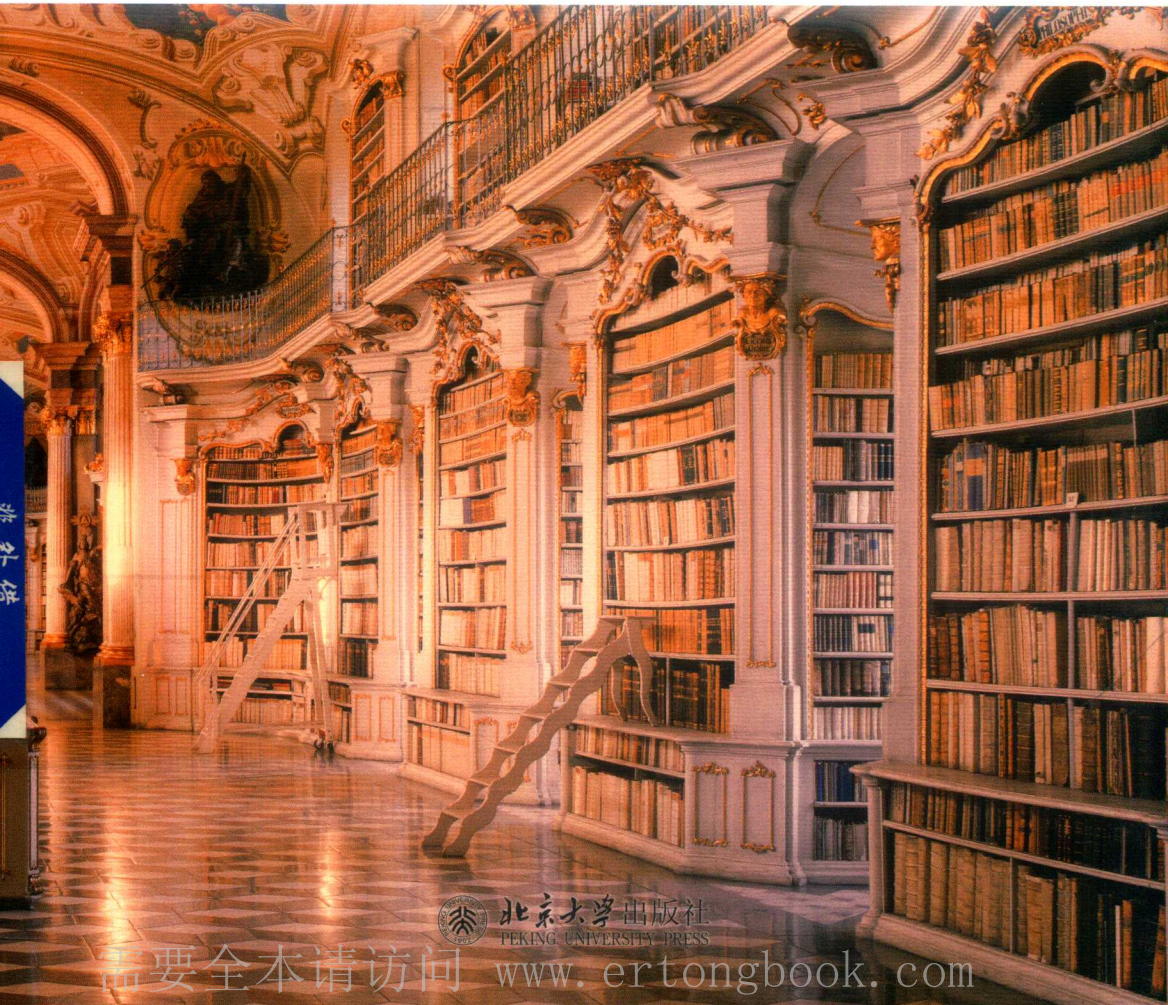
大/学/之/道

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Fifth Edition)

大学之用
（第五版）

[美]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 著
高铦 高戈 汐汐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Fifth Edition)

大学之用
（第五版）

[美]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 著
高铦 高戈 汐汐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5-465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之用：第五版/（美）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著；高铦，高戈，汐汐译.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2

（大学之道丛书）

ISBN 978-7-301-29311-9

Ⅰ. ①大… Ⅱ. ①克…②高…③高…④汐… Ⅲ. ①高等教育—教育史—美国—20 世纪 Ⅳ. ①G649.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9495 号

Copyright © 1963, 1972, 1982, 1995 and 2000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大学之用（第五版） DAXUE ZHI YONG（DI WU BAN）
著作责任者	〔美〕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 著　高铦　高戈　汐汐　译
丛书策划	周雁翎
丛书主持	周志刚　张亚如
责任编辑	周志刚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9311-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yl@pup.edu.cn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3056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2.5 印张　186 千字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本书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 大学之道 —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高等教育的新世纪(2001 年序)



我在 1963 年哈佛大学所作的戈德金演说*中说:“美国的大学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虽然维系着往昔,却正在摆向另一个方向。”我想我知道它们当时正在摆向何处,而历史已经证明我总的说来是对的,我当时正瞩目于 20 世纪末的远景。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 21 世纪,我再一次看到美国的大学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可是,这一次我看到这种转折在来自许多方向的风势中飘忽摆动——可不是温和的微风!所以我加了新的一章,回顾 1963 年的情景,勾画 2000 年所显露出的一些未来的可能,以及一些行动的方针。我知道自己不再具有 1963 年时的正常视力,但仍然想看看路途上出现了什么——我看到路上满是坑坑洼洼,盗贼密布,通向不明的终点。

因此,《大学之用》的第 5 版以对比 1963 年与 2000 年情况的新的一章收尾。前面的第一、二、三章是我原来的戈德金演说。然后是我就 20 世纪其余时期大约每隔 10 年的发展态势所写的一些论述,它们也收录在其后各版中。

第四章写于 1972 年,所涉及的是 60 年代学生造反以后我的一些反应。我在 1963 年的演说成了学生活跃分子的靶子。他们不喜欢我所描述的新的大学世界。学生们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也是不喜欢这个新世界的病态的,而且是其最早的和主要的批评者。“巨型大

---

* 戈德金演说全名为“戈德金演说——论自由政府与公民责任之要旨”,最初为纪念埃德温·劳伦斯·戈德金(1831—1902)而创设于 1903 年。该演说在哈佛大学公共行政研究生院主持下每年举行一次,此研究生院在 1966 年改名为约翰·F.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译者注

学"(multiversity)成了"克拉克·克尔的巨怪",甚至暗指我是"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①] 随后,在伯克利的斯普劳尔广场上我被简化为"法西斯分子"。人们可能会认为一个大学校长的明智做法是什么也不要写,或者要写的话就只写些老生常谈。我为了当一名诚实的和现实的评论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五章写于1982年,它回顾了学生造反以后尝试学术改革的十年。这个时期产生了许多宣言但没有多少持久的效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师生积极分子治校方法的"参与性民主"只是昙花一现。主要的长久性改革是设置了一批颂扬族群、种族和性别多样性的课程,通常在大的大学中会影响到1%或者不到1%的课程设置。学术改革的这一经验说明,一些教授在注视外部世界时可以多么激进,而当他们向内注视自己时又是多么保守——这是一种分裂的人格。

第六章是我在1995年版中增加的三篇评论中的第一篇。回顾起来,现在我注意到它们总体上都有着悲观的调子:本科生"自由教育"*的衰亡,大学被学科领域、意识形态、性别和族群地位所分散割裂。但与此同时,可以清楚看到美国的大学已成为世界上至高无上的研究机构。它取代了德国大学在19世纪末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领导世界的地位。

1963年的社会氛围是愉悦、快活的,但到1994年我写论文的时候,社会情绪却主要是沮丧和疑惑。为什么精神有这么大的变化呢?随着经济生产率增长降到历史低水平以下,资金的流入减少了。联邦

---

① **"只要加一句话,克尔的书就会成为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的著作。"**(黑体是原有的。)引自 Hal Draper, "The Mind of Clark Kerr," in Hal Draper, *Berkeley: The New Student Revolt*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5), p. 212。

* liberal education起源于古希腊的 *eleutherios paideia*(自由人的教育,绅士的教育)和古罗马的 *Liberaliter educatione*(字面含义为"自由人的教育",一般译为"绅士般的教育")。16、17世纪,在英国与绅士理念相合流,遂演变为近代博雅教育概念,并在18、19世纪成为体系化、理论化的教育学说。在18、19世纪的英国,liberal education中的liberal一词具有两个最为基本的语义:1. 博学的、通识的、非专业性的、丰富的;2. 符合绅士身份的、高雅的(genteel),liberal education意指以培养绅士为宗旨,以古典文学、逻辑和数学为基础的非专业性教育,当译做"博雅教育"。19世纪初,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一词逐渐在英国流行开来,并成为liberal education的同义词。至20世纪,liberal education和传统的绅士阶层脱离了联系,但继续意指非专业性的教育,等同于通识教育。与此同时,由于心智训练学说和自由主义在教育理论领域占据主导地位,liberal的语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语义不再包括"符合绅士身份的、高雅的",liberal越来越等同于"解放的"(liberating)、"自由的"(free)。因此,在20世纪的美国,liberal education一般可译为"自由教育",意指以解放心智为目的、以培养自由公民为宗旨的非专业性教育。本书除了在少数地方根据具体语境将liberal education译为"博雅教育",一般都译为"自由教育"。——译者注

政府在“二战”以后对高等教育的巨大热情(表现为对研究、发展和学生拨款及贷款的支持)已经消竭。

学生入学的快速增长趋势已经放慢,虽然人们所预计的80年代“人口萧条”并未出现。

学术改革运动已经失败。最后一次企图恢复重视本科生及其自由教育的努力——在圣克鲁斯加利福尼亚大学——落败了,早些时候在芝加哥大学的哈钦斯试验和哈佛大学的“红皮书”改革也是如此。大学界分裂为一系列互相争斗的成分。经济萧条减少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资助。1963年的“光明在前”变成了1994年的“暗云四起”。

当时我并没有认识到90年代中期学术界情绪的变化究竟有多大。它已成为各界中最糟糕的状况。高等教育在1980年已进入萧条状态而且持续如此——学术大萧条。

第七章也写于1994年,它继续讨论这一萧条,特别注意到了高等教育外部资金的减少。它也痛感高等教育“行会”地位的瓦解以及亨利·罗索夫斯基所谓的专业人士“公民道德”的沦丧。[①]

第八章是1995年版增加的评论中的最后一篇,继续描述似乎会在今后出现的一些艰难选择,特别是高等教育长期面对的却从未找到满意结果的一些选择。一个就是如何更好地使用资金,另一个是高等教育如何更好地帮助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可是,在探讨美国高等教育的未来时(这是我在1963年就已开始的工作),我以谨慎的乐观态度结束了此章。

第九章为这一系列论文作结。一本书能持续如此之久,这要归功于哈佛大学出版社,尤其是主编艾达·唐纳德的善意与持久的兴趣,现在我谨将这些论文呈献给他。这一章提出了摆在面前的一些挑战,它们的复杂性使我们在1963年所面临的任何情况都相形见绌。本章结束时我的态度可以称之为“谨慎的困惑”,但我深信,新知识仍然在使世界运转,大学仍然是它的主要源泉。

---

① Henry Rosovsky, *The University: An Owner's Manual* (New York: W. W. Norton, 1990), p. 297.

1963 年序



美国的大学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虽然维系着往昔，却正在摆向另一个方向。本书基于 1963 年 4 月 23 日、24 日和 25 日在哈佛大学所做的 1963 年戈德金演说，旨在描述和评价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些意义重大的新发展。书名“大学之用”意味着一个总的说来比较乐观的调子，因为我们主要关心的不是大学之**误用**。然而，与此同时，也要指出：在后面的讨论中，分析不应混同于赞成或辩解性的描述。

虽然大学是我们最古老的社会机构之一，今天的大学在社会里却具有一种相当新颖的地位。它面临没有什么先例可循的新角色，仅用老生常谈是无法掩盖清晰可见的变化的。老生常谈和缅怀既往没什么用，大学需要严格注视它今天所处的现实世界。

对大学来说，基本的现实是广泛承认新知识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我们现在正在觉察到：大学的无形产品——知识——可以是我们文化中唯一最强大的因素，它影响各种职业，甚至社会阶级、地区和国家的兴衰。

由于这一根本现实，大学正在前所未有地被要求生产知识来满足公民和地区的目的，满足国家的目的，甚至根本不为什么目的，就是相信大部分知识最终都可以为人类服务。而且，大学还被要求把知识传递给空前广泛的人民大众。

这种现实正在重新塑造大学的性质和质量。关于师生关系、研究、教务与行政作用的老观念正以无可比拟的速度变化着。而这一切发生在似乎整整一代人正在敲着大门要求入学的时候。对本性保守的大学教师来说，新一代人敲门的声响往往类似于暴民的嚎叫。对政

客来说,这是要服从的信号。对行政领导来说,这是我们处在新时代的一项警告,警告我们现在作出的决定将不平常地产生佳音或恶果。

因此,大学已开始在我们所有人中间具有新的中心地位,对于那些从未见过常青藤学府的人们以及那些业已学成或仍在寒窗苦读的人们都一样。

直到最近,大学始终是突出地未曾得到研究的机构。西摩·哈里斯是我最早结识的经济学家朋友之一,他把教育作为任何其他社会活动来观察并对它进行经济分析。今天,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正在各方面受到细查。这反映出它对经济增长、国际竞争、政治与社会发展以及文化发展的用途。我们不知道在人们开始连篇累牍地写作和谈论大学以前,在人们开始意识到它的用途以前,大学是不是一处更好的地方。

目　录

高等教育的新世纪(2001 年序)/ 1
1963 年序/ 1
第一章　巨型大学的理念 / 1
第二章　联邦拨款大学的现实 / 27
第三章　才智之都的未来 / 49
第四章　20 世纪 60 年代造反以后的再思考 / 72
第五章　试图改革的失败 / 86
第六章　对研究型大学黄金时代的评论 / 107
第七章　一个新的时代?
从增加联邦财富到增加州的贫困 / 125
第八章　艰难的选择 / 140
第九章　狐狸世纪的“才智之都”? / 150
专名对照表 / 17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巨型大学的理念



大学开始时是一个单一的共同体——老师和学生的共同体。甚至可以说，它具有灵魂，即某种生机勃勃的核心原则。今天，大型的美国大学就是用一个共同的校名、共同的校务管理委员会和有关的目标结合在一起的一系列共同体及活动。对这种巨大的转型，有些人表示遗憾，许多人表示同意，还有少数人感到得意。但是，这应当得到所有人的理解。

今天的大学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通过它同过去的情况作比较而得到了解——同红衣主教纽曼的学术修道院作比较，同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的研究机体作比较。这些都是它从中派生的理想类型，它们仍然构成它的一些居民的幻想。可是现代的美国大学既不是牛津大学也不是柏林大学，它是世界上的一种新型机构。作为一种新型的机构，它不是真正的私立，也不是真正的公立；它既不完全是世界的，也不完全脱离世界。它是独特的。

把“大学的理念”表达得最好的或许是红衣主教纽曼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从事建立都柏林大学时所说的话。[①] 他的观点反映了当时他所在的牛津大学的发展现状。红衣主教纽曼写道，一个大学是“一切知识与科学、事实与原则、探究与发现、实验与思辨的至高保护力，它划出才智的领域，使任何一方既不侵犯也不投降”。他赞成“博雅知识”

① John Henry Cardinal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47). 这里的引文摘自 pp. 129, 91, xxvii, 157。

(liberal knowledge),说"有用的知识"是"一堆糟粕"。

纽曼特地同培根的幽灵作斗争,培根在大约250年前曾经谴责"那种对心智的崇拜……人们由此过多地脱离对自然的思考以及对经验的观察,一直在自己的理性和幻想中反复折腾"。培根相信知识应当是为了人类的福祉和裨益,认为它"不应当像只满足取乐和虚荣的妓女,或者为主人驱使的女奴;而应当是能传宗接代和愉悦欢娱的妻室"。①

纽曼对此回答称:"知识可以是它本身的目的。人类心智的构成特点在于:任何一种知识,如果真的是知识的话,就是它本身的酬报。"他在一次对培根的尖锐攻击中说:"先生,你会说,功利哲学至少起了它的作用。我承认——它目标低下,但它完成了它的目标。"纽曼觉得其他机构应当从事研究,因为"如果大学的目的是科学与哲学的探索,那么我真不明白大学为什么要招收学生"——这个看法赢得了今天学生们挖苦式的模仿,他们时常认为他们的教授对他们根本不关心,关心的只是研究。纽曼说,大学的训练"旨在提高社会的智识风尚,培育公众的心智,纯洁国家的情趣,为大众的热情提供真实的原则,为大众的渴求提供确定的目标,使时代理念开阔而清醒,使政治权力便于行使,使私人生活的交往温良优美"。它使人"能出色地担任任何职务,能熟练地掌握任何问题"。

这个美妙的世界就在它被如此美妙地描绘时就已永远地破碎了。1852年,正当纽曼写作(《大学理念》)的时候,德国的大学正成为新的楷模。民主、工业与科学革命都在西方世界大力进行。"在任何社会里游刃有余"的先生们很快对什么都不在行了。科学开始取代道德哲学的地位,研究开始取代教学的地位。

用弗莱克斯纳的话②来说,"现代大学的理念"已经在诞生了。弗莱克斯纳在1930年说,"大学不是处在一个时代的社会总体组织外

---

① Francis Bacon,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Essays, Advance Of Learning, New Atlantis and Other Places* (New York: Odyssey Press, Inc., 1937), pp. 214-215.

② Abraham Flexner, *Universities: American, English and Germ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引文摘自第3、4、42、179、132、25、44-45、197、193、231、235、197、178-179页。

部，而是在其内部。……它不是分隔开的，不是历史的，尽可能不顺从于或多或少的新势力和新影响。正相反……它是时代的表述，也是对今日和未来发生着的影响”。

很清楚，1930 年时“大学已发生了深远的变化——通常朝着它们所参与的社会演变的方向”。这种演变使系科成为大学，出现新的系科；越来越多的研究所出现了；成立了巨大的研究型图书馆；把进行思索的哲学家变成实验室里或者图书馆书库里的研究者；从专业人员手中取来药物交到科学家之手，等等。不是关心学生个体，而是关注社会的需要；不是纽曼的“自然规律的永恒真实性”，而是新事物的发现；不是多面手，而是专门家。在弗莱克斯纳的话里，大学成为“一个有意识地致力于追求知识、解决问题、鉴别成就以及培训真正高水平人才的机构”。一个人不再可能“精通一切”——纽曼的万能通才人物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正当弗莱克斯纳写到“现代大学”的时候，它却又不存在了。洪堡的柏林大学正在被玷污，就像柏林大学曾经玷污牛津大学的灵魂那样。大学包罗了太多的东西。弗莱克斯纳自己抱怨说，它们是“中等学校、职业学校、教师培训学校、研究中心、‘进修’机构、生意事务——如此等等，一股脑儿”。它们从事“难以置信的荒唐活动”，处理“一大批无关紧要的事务”。它们“不必要地使自己丢份儿、庸俗化和机械化”。最糟糕的是，它们成了“公众的‘服务站’”。

甚至是哈佛大学。弗莱克斯纳核算：“哈佛的总支出中不到 1/8 用于大学应当进行的大学**核心**学科。”他奇怪的是：“谁把哈佛逼上这条邪路？谁也不是。它喜欢这样；这种事情喜欢这样。”这显然不讨弗莱克斯纳的喜欢。他希望哈佛摆脱商学研究生院，如果它必须存在的话，就让它成为“波士顿商学院”。他也不要新闻学院和家政学院，不要足球课、函授课程以及其他许多东西。

不但哈佛和其他美国大学是如此，还有伦敦大学。弗莱克斯纳质问：“伦敦大学到底算是什么意义上的大学？”它只是“一个联合会”。

到了 1930 年，美国的大学已远远脱离弗莱克斯纳的“以文理科研究生院为中心的、有坚实专业学院（在美国主要是医学院和法学院）及某些研究所”的“现代大学”。它们正越来越不像“真正的大学”——所谓

"真正的大学",弗莱克斯纳指的是,"一种以崇高的和明确的宗旨以及以精神与目的的统一为特点的有机体"。当弗莱克斯纳在1930年写到"现代大学"时,现代大学已经几乎死亡,就像老牛津大学在1852年被纽曼理想化时那样。历史的发展快于观察家的手笔。古代经典和神学以及德国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不能为真正现代的大学——巨型大学——定下调子。

关于"巨型大学的理念",没有吟游诗人为其唱赞美歌;没有预言家宣告它的形象;没有守护人保卫它神圣不可侵犯。它有它的批评者、贬损者和侵犯者。它有它的叫卖者向愿意听的人推销商品——许多人买了。但是它的现实也扎根在历史逻辑之中。在各种高雅的选项中它是绝对必要的,而不是有理由的选择。

内森·珀西校长在他给哈佛大学监理会委员们的最新年度报告中写道,当前委员们的平均毕业时间是1924年;而1924年以来哈佛已发生了许多事情。一半的建筑物是新的。教师增长了5倍,预算增长了近15倍。"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促使课程设置和当代大学性质发生改变的例子:拓展国际视野,推进知识,以及尝试越来越复杂的研究方法。……亚洲与非洲,无线电天文望远镜,微波激射,激光,以及1924年想象不到的星际探索方法——这些和其他发展引起了当代大学学术取向和志向的巨大变化,使得我们学生时代所了解的大学现在看来是奇怪地不发达,确实是非常简单的、几乎不相干的一种机构。而变化的步子还在继续下去。"①

不仅仅是哈佛。加利福尼亚大学1962年各种来源的运营开支几乎达5亿美元,而且另有近1亿美元的建设费;总共雇用4万人以上,比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还要多,而且有多得多的各种努力;有一百多个场所、校园、试验站、城乡推广中心以及包括五十多个国家的国外项目;它的大学概况手册中几乎包罗1万门课程;与几乎每个产业、几乎每级政府、本地区的几乎每个人确立了某种形式的合同。提供并保有大量贵重设备。它们医院里有4000名婴儿出生。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鼠供应者。它很快将会有世界上最大的灵长目聚居地。

① Harvard University, *The President's Report*, *1961-1962*, p. 3.

它很快也会有10万名学生——其中3万是研究生，可是它的开支中直接用于教学的远远不到1/3。它已经有大约20万名进修补习生——包括全州1/3的律师和1/6的医生。哈佛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是许多大学的写照。

纽曼的“大学的理念”仍然有它的热心坚持者——主要是人文学者和通才主义者以及本科生。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的理念”仍有其支持者——主要是科学家、专家以及研究生。“巨型大学的理念”有它的实行者——主要是现在的大学教职员之中那些为数众多的行政管理人员以及社会上一般的领导集团。在大学教师俱乐部和学生咖啡馆里，对这方面的争论仍然进行着；而牛津、柏林和现代哈佛的模式都以其性质与目的的单一想象鼓舞了一度是“师生共同体”的部分人。这些相互竞争的大学理念，各自涉及的是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势力网，造成了今日大学界的许多疾患。大学对不同的人而言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事物，它必定会与自身局部地发生争斗。

巨型大学是怎么发生的？没有人创建它；事实上，也没有人设想它。它在很长的时期里逐渐出现，它还会长时期继续下去。它的历史是什么？它是怎么治理的？巨型大学内的生活怎么样？它存在的道理是什么？它有没有前途？

历史线索

巨型大学肇始于诸多历史线索。就识别其起源而言，可以追溯到希腊时期。但当时就有若干个传统。柏拉图使他的学园主要专注于真理本身，但也专注于那些将成为君王的哲学家们的真理。诡辩学派，他们为柏拉图所憎恶而被安上一个持续至今的恶名，也有他们的学府。这些学府讲授修辞学以及其他有用的技能——他们更感兴趣于生活中可以达到的成就而不是难以达到的真理。毕达哥拉斯信徒们关心数学与天文学。现代学者喜欢把他的学术祖先追溯到柏拉图学园的林间，但是有着专业学院和科学研究所的现代大学可能同样瞩目于诡辩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者。人文学者、专业人员和科学家们也

都寻根到古代。“两种文化”或“三种文化”都几乎同文化本身一样古老。

可是,尽管有它的希腊先驱,正如黑斯廷斯·拉什达尔所写的,大学是“显著的中世纪机构”①。在中世纪,它发展出今天流行的许多特点——一个校名和一个中心场所,具有某些自主权的老师,学生,一套讲课系统,一个考试与学位程序,甚至一个具有若干系科的行政管理结构。(意大利)萨莱诺大学的医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法学,以及巴黎大学的神学与哲学都是伟大的先行者。大学开始成为专业的中心、古典研究的中心、神学与哲学论争的中心。效法巴黎大学而产生的牛津与剑桥以它们独特的方式发展着,它们特别强调寄宿制专业学院而不以分散的系科作为主要单位。

到18世纪末,欧洲大学成为寡头机构,从此之后很长时期一直如此。其教学内容僵硬,在它们的社会中成为反动的中心——在很多方面反对教会革新运动,不赞同文艺复兴的创造精神,对新科学抱有对抗情绪。它们对当代事务的不屑一顾简直相当明显。它们就像没有窗户的城堡,极其内向。但是变革的潮流可以冲击得相当深入。在法国,大学被大革命冲垮,几乎像克伦威尔时期的英国那样。

大学在德国得到了重生。哈雷大学在1693年完全取消了讲授拉丁文,哥廷根大学在1736年开始讲授历史学。但正是威廉·冯·洪堡凭借他在普鲁士内阁中的优越地位而于1809年建立了柏林大学,这是戏剧性的事件。强调的是哲学与科学、研究、研究生指导、教授与学生的自由(教与学的自由)。成立了系和研究所。教授确立为大学内外的大人物。柏林大学的规划很快扩展到全德国,当时德国在拿破仑手下遭受溃败的震惊之后正进入一个工业化和强烈民族主义的时期。大学带来了两大力量:科学与民族主义。确实,德国大学系统后来由于无批判地依靠终生统治它的系和研究所的专科大人物而陷于困境,以致因为全部依赖国家而被希特勒破坏。但是这并不否定这个事实:19世纪的德国大学是世界上强有力的新机构之一。

---

① Hastings Rashdall,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3 vols., 1895, ed. F. M. Powicke and A. B. Ernden, Oxford: Claredon Press, 1936), Ⅲ, p. 358.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